

唤醒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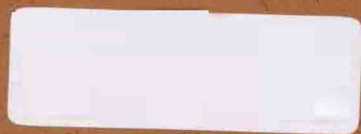
城市化背景下的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

郑育林◎著

文物出版社

唤醒遗迹

城市化背景下的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秦 风 金 马

责任印制：张道奇

装帧设计：北京·雅昌设计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唤醒遗迹：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 / 郑育林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010-3982-1

I. ①唤… II. ①郑… III. ①文化遗址—文物保护—研究—中国

IV. ①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9474号

唤醒遗迹——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

著 者 郑育林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982-1

定 价 90.00元

序言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4个王朝在此定都，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和时代最长的省份。文明史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在20.58万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上，分布着各类文物古迹4905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7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157处。在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中，古遗址23453处；古墓葬14367处，约占陕西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的3/4。因此，大遗址是陕西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陕西大遗址有的是中华文化起源的遗址，有的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遗址和帝王的陵园遗址，具有分布广、数量多、面积大、等级高等特点。这些遗存及其地上、地下的建筑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均是当时科技、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典型代表，是当时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典型代表，是“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大遗址中，以都城遗址和帝王陵园为代表的大遗址紧紧依托以西安为中心的城市及周边，不仅保护工作任务艰巨，且与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休戚相关。

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矛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及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共同载体——土地的竞争，使得矛盾更加尖锐。作为文物工作者，既要做好大遗址保护和传承，又要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文物保护管理者应积极探索和引导的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我省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西北大学的有关专家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大遗址保护所面临的困境，我曾作为课题的组织者，以汉长安城遗址为实例，组织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指出大遗址保护面临

的主要矛盾是“传统的、单一的、限制性的绝对保护模式与遗址区域内群众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开展观光农业的解决对策，得到相关方面的积极响应。之后几年，我们重点进行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新思路的探索和研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当地政府和居民从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受益，把大遗址保护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大系统、大体制中，纳入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层面上来，从而调动和激发全社会保护大遗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大遗址保护工作富有生命力，具有号召力，使大遗址的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共生共荣。

应该说，陕西经济社会是以西安为中心发展的，对于城市中大遗址保护工作如何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和重要的课题。2000年初，针对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我曾从城市文化景观角度认为：大遗址保护能够完全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积极力量，能够改善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够惠及广大民众。第一，大遗址是城市文脉，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是延续城市文脉；第二，这些大遗址是城市文化景观的核心要素和组成部分，是增强城市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第三，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可以和谐共同发展。在此期间，我主持进行了安阳殷墟保护规划编制研究工作，相关理念的运用获得了各方肯定，为殷墟最后申遗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也证明了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加强大遗址保护，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以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多赢”局面。

在此后，我们以西安为中心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使大遗址保护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积极力量。2008年，我们探索出“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四个结合新理念，积极推动陕西、西安大遗址保护工作。针对不同大遗址的具体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在陕西形成大遗址保护不同的资本运作模式。即：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汉阳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国家公园模式”；以大明宫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集团运作模式”；以延平门遗址公园、曲江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市民公园模式”；以大唐西市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投资模式”；以汉杜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退耕

还林模式”等五种不同类型的大遗址保护实践模式。我们认为，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应从单一的限制性保护思维，转向“四个结合”模式，即做好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四个原则。

2010年10月，陕西以秦始皇陵、汉阳陵和大明宫遗址为代表的遗址公园获得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数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秦咸阳城、汉长安城遗址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这些优秀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我省多年来在大遗址保护领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成功，同时也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省大遗址保护“四个结合”新理念和保护成果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10万多群众得到了实惠，极大地提升了西安的城市生态环境，成为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成为融合大遗址保护、教育、科研、游览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成为西安最美丽的文化景观。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结合新农村建设，在移民安置区统一建设了高标准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了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设施，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大大改善了搬迁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些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文物保护和展示任务，同时将保护与改善城市生态、人文环境和改善群众生存环境、生活水平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

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同志指出，在陕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当中，特别是文物、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我们的文物、文化的优势正在成为陕西省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在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竞争优势。正是由于陕西大遗址保护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汉长安城等重要大遗址被省政府列入了陕西省重要民生工程。

郑育林同志从2005年到西安市文物局工作，在这一期间正是陕西大遗址保护新理念、新模式不断创新和实践的过程，而陕西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主要以西安地区为中心展开，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成果。在陕西大遗址保护工作推进过程中，郑育林同志从大遗址保护项目启动、实施，到大遗址保护理念、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我省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唤醒遗迹——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就是郑育林同志在担任西安市文物局局长期间，作为工作推动、管理、实践者的过程中，在对大遗址保护管理问题的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角度对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学术总结。作者通过大量文化遗

化遗产保护案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很多理论创新意见和管理模式。他认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科学揭示大遗址的本质属性；充分认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特殊矛盾，是深入了解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辩证关系的前提；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科学解决，必须突破技术与经验的局限，在理念上进行创新；文化遗产作为资源有其特殊的性质，应该遵循文化遗产的特殊运动规律对其进行科学开发。

《唤醒遗迹——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陕西大遗址保护理论成果和探索，尤其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丰富多样的保护理念、理论的提出，对于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规律探索，实现科学开发大遗址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这些理论成果对促进陕西大遗址保护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有新的贡献。

期望这部专著能够成为我们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更期望它能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为我们提供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更多、更全、更深的创新和发展新思路、新方法；也期望能够引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西北大学教授

前言

在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历尽历史坎坷与时代风雨，终于走上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奋力追赶，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并且取得了持续高速发展的伟大成就。经济的强劲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劲支撑；城市化反过来又牵引经济发展，使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经济市场化发展道路与整个社会城市化发展阶段，是中国当代社会两个最为显著的发展特征，二者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但是，人们意识到，仅仅看到它们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并且为之振臂高呼是不够的，市场化道路与城市化过程并不是一曲接一曲的美妙乐章，像许多事物发展一样，在它们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的段落。

本书关于文化遗产领域中现实问题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得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与强烈关注，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存在着诸多困境、难以避免矛盾与冲突的尴尬局面。像大遗址这类价值非常珍贵、内容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大多数处于城乡结合地带而历史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大遗址日益遭受城市规模极度扩张的空间挤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性冲击、城市居民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活动的软性围剿等等；另一方面，大遗址地区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与生产发展等等，都无不因大遗址而受到国家文物保护方面法律与政策的制约。

大遗址所面临的困境，在客观上使得土地资源的相对紧缺性与文化遗产资源的绝对珍稀性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被人为强化到极致；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这一行业性与实践性极强的特殊问题，在城市化背景下，逐步演化成了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性矛盾。

如何科学认识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

大遗址、科学合理地开发与利用大遗址，实现大遗址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围绕这些问题，2005年以来，西安、洛阳、杭州、成都等城市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性实践，实施了一批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成了一批遗址公园，都试图从实践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方式之一，它的实践效果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关注，尤其以西安的唐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为，政府部门领导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问题上大义凛然的政治态度、统筹兼顾的智慧抉择以及奋力推进的勇敢行动；遗址区居民的热切期盼与积极呼应，文化遗产领域内一些权威人士所表达的强烈质疑与冷眼观望，文化遗产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的社科理论工作者们对遗址公园以及大遗址问题所产生的强烈的研究兴趣；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与机构所面临的观念冲突与体制创新的纠结，各种媒体喋喋不休的议论与记者们穷追不舍的刨根问底。大遗址究竟应该怎样保护与利用才能符合科学发展的时代理念？怎样做才能将大遗址这样的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财富与驱动力？这是本书所要追寻的主要目标。

本书将在分析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大遗址的现存状况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应用德尔菲研究方法，以在西安地区中国周秦汉唐四大都城遗址区的实际调研所获取的资料为基本素材，结合中国大陆地区大遗址保护工程以及国外古迹遗址保护工程的典型案例，突破“就保护谈保护，就利用谈利用”的思维定势，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深刻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价值体系，深刻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规律，努力探索现实意义上科学开发大遗址的基本路径，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际决策提供理论支撑。这是我们研究大遗址问题的基本路线。

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 大遗址问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大遗址问题？大遗址问题的重要性如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问，是因为我们发现，你如果把大遗址问题放在不同的条件下去认识，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不同的。譬如，你是从历史学、考古学角度去认识大遗址，还是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去研究大遗址，还是以生态环境、城市规划的角度去分析大遗址等等，由于各路专家学者的视角不同，出发点不同，路线不同，对大遗

址的认识结论当然会不尽相同。我们进而还发现，大遗址问题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问题，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在过去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时期，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关于大遗址保护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文物本体预防自然力风化侵蚀等逐渐损毁的预防与修补，大遗址问题也只是文化遗产领域内的普通问题之一。尽管大遗址本体体量巨大，占据土地面积与空间巨大，但是如果它远离现代城市，它的存在就有可能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能既无激烈的矛盾冲突，又无相互利好的依存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大遗址问题可能被社会所忽视。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大遗址之所以成为人们所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因为大遗址存废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遗址遭受到城市规模急速扩张的挤压，现存状况危机四伏，令人十分担忧；另一方面大遗址严重制约着当地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成为制约遗址区居民生活发展、生活改善的直接因素。因此我们认识到，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问题。人们已经取得的一致认识是，大遗址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真实见证，是现实存在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财富的综合体，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在社会基本价值上的一致性是由大遗址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有关的社会实践也一再地提示我们，大遗址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普遍产生的社会问题，只有在科学思想指导下，以已有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为基础，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才有可能寻找出解决大遗址问题的根本路线与方法。

2. 大遗址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或者说，如何科学认识大遗址的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质？准确而又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是研究大遗址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对于可移动文物与古建筑类的文化遗产，人们关于如何保护与利用大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研究历史还很短暂，对大遗址的管理与研究远不及对馆藏文物的管理与研究。由此我们还发现，人们在研究大遗址时所使用的概念体系，仍然是基于馆藏可移动文物或者古建筑类文物所建立起来文化遗产概念体系，这就有可能使研究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对馆藏可移动文物，或者对古建筑类文物价值认识直接应用于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导致对大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认识不准确，形成浅见、偏见，甚至误解。当我们置身

于几个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大遗址之中，常常会被历史遗迹宏大无比的规模所震撼，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被历史湮没的感觉。当人的感官被淹没的时候，人的认识往往难以逃脱被淹没的结局。对于馆藏可移动文物，我们可以置其于我们的股掌之中反复地把玩，甚至可以借助于科学仪器仔细观察研究；对于一个单体的建筑物，我们也可以立身通观，里外触摸，上下端详与琢磨；而唯有大遗址，它会把我们淹没，我们置身其中却难以覆反它。这提示我们，由于我们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空间几何尺寸上的相对量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通过直接观察所得到的结论的准确性，假如我们大部分研究资料的直接获得，是靠经验而非理性。如果面对新的问题，现实的经验仍然徘徊在历史认知的阈限之中，我们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也就很难发现深藏于现实问题表象之中的本质所在。因此，我们提出，不能以小尺度的可移动文物的价值，或者中尺度的单体建筑物的文物价值，来衡量大尺度的大遗址。大遗址作为大尺度文化遗产，一定有别于小尺度的馆藏可移动文物、中尺度的单体建筑类文物，无论是关于它的价值的认识或者价值的社会实现过程，都应该具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认为，大遗址在承载巨量历史文化信息的时候，记录历史地标的意义最为重要、最为独有。一段历史的相关信息遗留下来，会有种种不同的载体，会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大遗址是以它独有的巨大规模，在地上地下，以三维空间的形式，来蕴含历史文化、显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历史变化的印记。我们的研究过程说明，科学揭示大遗址的本质属性是研究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的理论基础。

3. 大遗址的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矛盾性有没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呢？或者说，为什么社会各方对大遗址极度关注而又态度相异呢？为什么中央政府强调严格保护，而地方政府却更加注重开发呢？这种情形为什么没有在馆藏文物或者单体建筑物上表现出来，而单在大遗址问题上激烈交锋？除了立场观点、方式方法之外，大遗址本身还有没有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客观因素存在，这是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表现为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方面矛盾冲突的大遗址问题，决定于大遗址自身价值的二重性。充分认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特殊矛盾，是深入了解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辩证关系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大遗址的地理结构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深入解析，发现大遗址的价值在结构上是由两部分组成，即绝对珍稀的文化遗产资源与相对紧缺的土地资源，这里，土地资源价值与

文化遗产价值在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上合二为一，就构成了大遗址的价值二重性。这两种资源统一性与不同性构成了大遗址问题的基本矛盾，即保护与利用；在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土地资源价值的实现过程与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实现过程可能会发生矛盾冲突；一切与大遗址有关的问题，都有可能与人们对这两类资源的态度有关系。这就构成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特殊矛盾。只有在充分认识这一特殊矛盾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了解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随着时空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因此，我们只有在深刻认识大遗址的内在矛盾基础上，透过大遗址问题的表象，深入大遗址社会利益关系层面，抓住利害关系，才能准确判断大遗址问题上的利益格局与社会价值取向，真正找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

4. 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解决，有无一般的规律可循？或者说，大遗址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存在着？大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给我们深入研究、认识文化遗产的运动规律提供一个重要道路。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具体的一种文化遗产，或者一种实在的文物本体，无论我们如何对待它，它的最终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消亡；正因为如此，我们保护的目，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努力延缓文化遗产的消亡过程，而并非企图使文化遗产的永恒存在。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物质的存在，从哲学意义上说来，就是在不断地运动着，运动着、变化着是它的常态，不变只是一种相对的静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的消亡过程，并非孤立的事物运动，自然环境的作用以及人类的相关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在文化遗产本体上留下印记，存下信息。所以，文化遗产本体将会在运动变化中，逐渐消失原有历史信息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增添新的信息，运动变化不止，信息的丧失与增添不止。既然如此，对于处在运动状态的文化遗产，我们保护的意义是什么，利用的意义又是什么，要深入而又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只有认识到了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殊运动规律，才有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应该遵循它的运动规律对其进行科学开发与利用。研究也证明，只有在充分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从大遗址本身的现状和自身的特点出发，遵循文化遗产运动的规律，进行科学开发才能实现保护与利用在社会意义上的协调一致。

5. 如何对大遗址进行科学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既然文化遗产的财富性、资源性是客观存在，那么对于它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就是必然或迟

早要发生的社会行为，只是，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应该如何去把握，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悉心设计，否则将会产生竭泽而渔的严重后果。所以说，大遗址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保护利用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技术与方法来实现。中国大遗址土质结构为主的性质，迫使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积极而又大胆地探索创新。我们的研究认为，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科学解决，必须遵循国际准则，继承我国传统，突破技术与经验的局限，在理念上进行创新。在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方面，由于中国土质遗址可视性比较差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积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建立起特有的理念，这个理念要以实现大遗址自身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为基础，努力适应中国的文化遗产生存的实际环境，努力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努力适应国际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水平。

In the past 60 years, through ups and downs, China has found its wa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recent 30 years, the developing of Chinese market economy prompting the urbanization greatly which form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urbanization acceler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ought Chinese society into a new historic phase of modernization.

The marketization in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in society are most significant two characteristics in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which promote each other mutually. However, only cheering for the achievements is not enough,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is more like a river which has twists and turns as well.

This book, with analysis of practical problems of cultural heritag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booming of Chinese economy has greatly stimulated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ed the civilization progress, and gained international praise in the filed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On this background,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has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confronts unavoidable conflicts. The Large-scale Site, richening in a significant values and meaningful contents, is mostly endangered for the majority of them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junction zon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On the one hand, the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residential living are increasing in occupying the protecting areas of the sit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mitations of land use defined by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Laws, have restric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ite areas.

The resource shortage of developing and the precious of cultural heritage occupied are both intensified in the same time-space background. As a result, th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of large - scale sit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which requires professional solutions based on a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has become a common conflict between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ince 2005, Xi' an, Luoyang, Hangzhou, Chengdu have made some experimental practice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large-scale site con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projects, built some archaeological parks. These practices try to find the answer of: Scientific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tes areas.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s a effective choice of Large-scale sit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which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experts. The construction of Daming Palac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which caused a series social focuses: The farseeing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decision-makers,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earnest support and expectation from local people; the questions and suspicions from the cultural heritage authorities; the great interests of case studies from social scientists and conservation experts; the conflicts of concepts and innovation of mechanism from the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from medias. Through all these above, this book is trying to find the answers of: how to protect and utilize these Large-scale site which can match the concep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 out-look? How to make the sites to be a great driv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large-scale site under urbanization, this book broke through the mind-set of "the conservation is just conservation projects and the utilization is only utilization projects" , adopted the Delphi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our large-scale sites of ancient capitals of Zhou, Qin, Han, Tang dynasties in Xi'a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existing illustrative cas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values system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explored basic principle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tried to come up with a realistic path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site,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ctual decision-making of the large-scale sit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is is the basic theoretical roadmap of our studi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studies, we have noticed following basic questions:

1, what's the nature of large-scale site problem? What's the source of this kind problem? What's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this problem? The reason of posing these questions is because, in different aspects or circumstances you studied on the large-scale site, you can get different answers. Experts of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urban planning, etc, will be different in their thinking. Furthermore, the large-scale site problem is in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In a less developed period or area, the conservation of large-scale site is mainly about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gainst nature erosion, which is a simple common question likes the other kind of cultural heritage. Large-scale site occupy abundant land and space, but if it's far away from city, it will not affect so deeply in development and living of people, and will be ignored by the society. The reason why large-scale site has become a focused question is because it has direct relation with local development.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is: the urban expansion has invaded the land of large-scale site; and the limitation in land use required by protection laws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site area. We have realized that the large-scale site in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in China is an integrated issue combini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Large-scale site is a historical witness and a

fortun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undamental consistency of it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s decided by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large-scale site. The issues of large-scale site are common social issues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we should do comprehensive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outlook an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knowledge to find out the fundamental routine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2, What kind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large-scale site is? And how to recognize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large-scale site as cultural heritage, this question is the premise of study of large-scale site. The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of movable large-scale site is relatively short comparing to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site is insufficient comparing to collection of relics and artifacts. Considering these factors, the concept which used in large-scale site is still based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formed by movable relic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is limitation may lead us to a misunderstanding consciously or not, in the imprecise concepts of historical,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values of the large-scale site, even to the wrong ideas. When people are inside a large-scale site of kilometers square scale, will be shocked and have a kind of feeling of submergence in history, and so do our thoughts.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relics and artifacts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by touching by our hand or observing by technical instruments,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historical building which can be looked outside and touched inside. This reminds us that the site of the large scale matters a lo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ion, and the study on large-scale site should have its specialty comparing with the movable small cultural artifacts and medium historical buildings. Therefore, in the huge amount of historical cultural information that the large-scale site bears, the historical landmark is its most significant meaning.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an be handed down in different ways by different carriers, and the large-scale site, in its unique scale, both on